

蹙将刀客身影系列

从蹙将到将军

潘运明 著

万劫不复的杀戮岁月
铁马金戈的征战历程
扑朔迷离的绿林生活
奇异人物的命运演绎



中国言实出版社

蹙将刀客身影系列

从蹙将到将军



潘运明 著

万劫不复的杀戮岁月

岁月金戈的征战历程

扑朔迷离的绿林生活

奇人怪物的命运演绎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蹙将到将军 / 潘运明著.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2.7

(长江文苑 / 贾凤华主编)

ISBN 978-7-80250-949-8

I. ①从… II. ①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808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电 话: 64924716 (发行部) 64924735 (邮 购)

64928661 (总编室) 64963107 (一编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设计制作 成都力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8-86965202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10 印张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33.00 元 ISBN 978-7-80250-949-8/D·370

引子：蹉将刀客杆子

豫西伏牛山属秦岭山系余脉，这里莽莽苍苍的巨山常常云雾笼罩，山色空濛，坡岭岗地则多是麻骨石、粗沙石、大青石等，石多土少，寸草不生，穷山恶水，种一葫芦收不了两瓢。因此，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山民，不得不成年累月深翻土地，垦荒造田，开渠挖沟，引水上山，想方设法多打粮食。

历史上，在这样的山岭中也有植桑养蚕的习惯，当地人称为“蚕坡”，一般由地主和商人占有，雇佣贫民代为经营。贫民受雇后，受到雇主的残酷剥削。育树、养蚕、抽茧、缂丝等所有农活与费用全部由受雇贫民负担，地主根本不管，待出茧成丝时，农民留得80%，地主坐享20%；另外，还有贫民单独经营出茧抽丝后，与地主平分。蚕农生活是相当困苦的，他们平时在山中劳作极为繁重。除养蚕成熟时，全家须紧张操作外，还须日日培植桑树，施加肥料，护养山林，并为地主家服役。蚕农具有这样的特点：家中多备有火枪、鸟枪等武器，看山护蚕，猎取鸟兽，男女则习于射击，命中率很高。

另外在宝丰、临汝、鲁山、伊阳等豫西南的一些县，由于地下储煤丰富，自宋朝或者明朝始，已有开挖煤窑的传统。煤窑分股份窑、公出窑两种。前者是自由组合开采，所得的煤各人平分。这些窑都是小窑，煤层很薄，工程大，从事采煤既繁重，得的煤又极有限。后者则由地主商人垄断经营，雇主开挖。雇主称老总，采煤者则有“死驳子”和“活驳子”之分。

“死驳子”原先都是为生活所迫的贫民，有的是被迫，有的是被骗而卖身于煤窑。他们入窑后，终身成为雇主的奴隶，没有丝毫人身自由。每日自晨及晚，均深入窑底，为窑主挖煤、背煤，除供饭食外，不予分毫报酬。“死驳子”在背煤时，脚步必须飞快，如稍为散漫，立即会遭到监工的鞭打。如此做苦工至死方罢，所以叫做“死驳子”，意为人入窑后就等于身死，永无恢复自由之日。“活驳子”的情况有所区别，他们均为附近的贫苦男人，因生活所迫而自愿去煤窑做工的。又被称为“煤黑子”。他们在窑上受“领驳子”的管束，在窑下则受窑头的支配，下窑后每天挖煤有最低的数量限制，没有达到要求数量就会挨窑头的殴打。大一些的煤窑，在窑头之下，还设有棚房，棚房一方面是技术指导，一方面又是监工，可以任意殴打煤工，煤工忙活一天后，才能领取相应的工钱。以后是否继续下窑做工，则悉听自便，因为他们来去自由，所以叫做“活驳子”。

煤工入窑后，窑中积水甚深，煤工赤身赤脚在水中劳作，常遇“水火炮”或“游西湖”的惨事。“水火炮”是窑中涨水或瓦斯爆炸，或伤或死；“游西湖”是矿井中煤坑积水很深，工人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坑内，坑口小，坑身大，多数有进无出，淹死的多。淹死后，窑主或工头根本不负任何责任。在最好的情况下，死者家属尚能得到几串钱的抚恤，更多的是白白死掉。可以说，煤工每天下井，都是用性命去冒险，谁都保不定今天下去，能否活着出来。

虽然煤工冒着生命危险下窑，工钱却极其微薄，每天给馍三斤，钱30文左右。而雇主与工头尚不满足，还想出各种办法，把极为有限的工钱从工人手中骗回。最普遍的是开设赌场，煤工在入窑之前，先去“领驳子”（工头）那里居住。“领驳子”供应饭食，并借钱给煤工，让他们在赌场上（“领驳子”的在窑边都开设赌场）赌。赌的结果总是一输再输，这时，“领驳子”便逼着下井干活，挣工钱还债。有不少煤工被骗上窑以后，一生都

是为了做工还债，有的至死还没有还清。能够自己挣钱的煤工，则亦往往被骗去赌博，结果，辛苦得来的几百文钱仍被雇主工头刮走。

在如此困苦的生活环境中，煤工们容易发生反抗思想和行动，特别是他们与普通农民不同，大家集中在一个矿场劳作，内部有一定的组织和团结力；加上豫西地带向来是绿林豪杰出没之地，有些人在作案后往往进入煤窑，深入窑底做工，官府无从拿访。由于有大批煤工存在，并且有煤窑作为绿林人物躲避之所，反抗思想传播再所难免。这样，就更给煤工带来了激进思想和意识。

“死驳子”在清朝时期虽然间或存在，但至清末已禁绝。民国初年，无论宝丰、临汝、鲁山、伊阳的煤窑都由“活驳子”开采。

制烧陶瓷在鲁山梁洼段店一带有着悠久的历史，该地与宝丰清凉寺、临汝严和店、禹县神垕相距很近，有“清凉寺到段店，一天进万贯”之说，可见制瓷业的繁荣。梁洼烧制的陶器与段店的唐花瓷、清凉寺的汝官瓷、神垕的钧瓷各成一宗。当时瓷的窑亦有两种，一种是窑工合伙自烧自销，平均分配所得收益，但规模很小；另一种则由雇主用窑工代为烧制，按月发给一定数量的工钱。

窑工收入与制瓷业的兴旺与否有着很大的关联。年成好时，制瓷生意就好，遇到天灾穷困，生意也就很坏，烧好的瓷器或卖不出去，或卖价很低，有时连最低成本都难以维持。窑工与煤工一样，也有一定的组织，由于生活困苦，有不少人常常投身绿林，从事反抗斗争。

豫西一带山高沟深，气候十年九旱，百姓种地收成不佳，为改善环境，只能在山腰间挖沟筑堰，垒石砌坝，阻挡山水，不致使水土流失。因而，除挖煤做窑工外开山凿石，引沟挖渠成了冬季农闲时候，男人所从事的一项主要活路，也是较为轻松一点的

活路。从事这项活路的人，大都有把好手艺，甚至有的本身就是木匠、石匠、铁匠、缸匠、窑匠、泥水匠等，身处地狱的煤工以及吃尽苦头的挑夫，也常常改行从事这项活路。每年冬春季农事稍闲后，到收麦时止，有4个多月的时间从事这种劳作，他们在做工时集成股杆，各有首领统率，被称作“蹚匠班”。这些“蹚匠班”在山里劳作，一班叫作“一杆子”，每一伙都举荐一个耿直公道的人做“杆头”，出外联系活路，分发工钱，处理纠纷等。杆头在杆子们心中占居崇高地位，杆子们对其忠心耿耿甚至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当某村需要修筑工程时，就找“蹚匠班”有威信、信用好的“杆头”商洽，双方商定工价和时间，由“杆头”包干领做。“杆头”包到活后，自去物色适当人选（多是30岁以下的男人），组成班子前去做工。

“杆头”有大杆头、二杆头、三杆头之分。“杆头”不在时，依次由其手下的二杆头、三杆头负责领工。做工前，雇主先付工价的三分之一，待工程进行一半时，再付三分之一，至最后完工，才付完剩余的三分之一。“杆头”按出勤天数发放工钱，衣食则需自理，当时仅豫西鲁（山）、宝（丰）、临（汝）、伊（阳）等县就有“蹚匠班”成百上千杆，达数万人之多。

同是处在受剥削被奴役的蚕农、煤工、窑工和“蹚匠班”，其生活也是异常困苦的。虽然如此，这些人却多少还有些与普通贫民不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集股成群，各有首领，多是换帖结拜的弟兄，内部有着严密的组织，多为30岁左右的青壮年男人，都为生活所迫而从事于此的。这些人三人一杆，五人一拨，闲聚忙散，没有固定的做工地点，哪里给的薪水多、工头说话和气，便相互一邀涌向哪里，流动性极大，四处乱跑乱蹚，当地人把这些说走就走说来便来的匠人们称作是“蹚匠”或“杆匠”。

由于做活的地方多是穷山恶水，民性剽悍，历代官府都把这些地方看作冲军发配之地，多不愿到此就任，导致这些地方天高皇帝远，藏污纳垢，盗贼土匪出没频繁。手握大刀，纵横自如，

吃穿不愁令人眼馋的土匪刀客生活，逐渐使匠活处于淡季啃干馍、喝泉水的蹚匠们心跳耳热起来。一经初步组织，这些人往往发展成为抢劫的“杆子”。起初，只是暗地里参与干一些诸如“采盘子”（侦察确定）、“挂线子”（联系地点）、“叶子阎王”（看管肉票）的轻活，后来，竟纷纷效仿，或三三五五与匪为伍，或成群结队拉杆结帮，甚至干脆变成明“蹚匠”暗匪股，周旋各地，“贴帖子”（送匿名信）、“犍条子”（劫路）、“拉票子”（劫人）、“撕围子”（攻打村寨）、“破圈子”（攻打县城）……杀人越货，攻城破寨。久而久之，在豫西伏牛山区，一伙“蹚匠班”便滋生出一杆盗匪。这些“蹚匠”、盗匪多出身贫民，不堪忍受贪官酷吏、土匪豪绅压迫、苛捐杂税盘剥等揭杆聚众闹事，以寻求活路，被迫落草。他们或啸聚于密林深谷，或盘踞于山脊岭寨，或割据乡村，或纵横异地，“犍条子”（劫路）、“拉票子”（劫人）多捡富门大户，杀贪官抗官兵，报私仇除愤怨，常被官府豪绅诬其为土匪、盗贼。而这些人一般都崇尚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古训，对于平民百姓不但不掠不劫，不骚扰地方，甚至还拿出抢来的财物予以周济，这种头裹巾帕，骑着快马，来去自如的“蹚匠”颇似旧时武将风格。因此，百姓不仅不惧怕“蹚匠”，同时还主动为其“踏线（收集情况）、“插签”（侦察确定），甚至担任警戒等。考“蹚”字，即：徒步涉水。这本是豫西南一带的口语，引申开来，在社会上混人物也称做“蹚”，如“蹚光棍”、“蹚蹚路”，混得好就是蹚得开，混得不好就是混打瓦，没蹚成事。“蹚”与“踢”相通，本来有“行为不端”的意思，“蹚匠”也就被当局和富户用以诬蔑起来反抗的人，而贫民们称叫起来则颇有褒扬之意，在褒扬之中，人们在口语里把“蹚匠”或“杆将”演变成“蹚将”。蹚将聚结一起或登“架子”（山）、或外出打劫称“起杆”，往往在走之前要举办一定的形式，寻神拜佛或祭祖许愿，以求神灵护佑。

刀客也是杆子的一种存在形式。刀客原是以刀为武器的江湖

勇士，在刀法上有所成就，并能够行侠仗义的武人方能称得起刀中的“客”，即为“刀客”。用剑的侠士称之为剑客，拿刀的侠士自然称为刀客。剑是礼器，代表正直、仁义等。刀为凶器，乃百兵之胆。用刀者舞起刀来，呼呼作响，寒光逼人，只闻刀风，不闻人影，勇猛威武，雄健有力。所以刀客也代表勇者。

刀客大约起源于清咸丰初年的关中地带，多为破产饥民、失业的手工业者及无业游民，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与严密的纪律，一般以结拜成弟兄为纽带，有一个类似首领的人物称大哥，其他手下的多称兄弟，数人数百十人集结一起也称其为“杆子”。据《陕西省志》载：刀客会是关中地区下层人民中特有的一种侠义组织。其成员通常携带一种临潼关山镇（今属阎良区）制造的‘关山刀子’，刀长约3尺，宽不到2寸，制形特别，极为锋利，故百姓称之为刀客，即便是到清末乃至民国舍弃刀剑等冷兵器，用上快枪快炮，刀客其名仍在沿用。而在清政府的文书中则把刀客称之为“刀匪”，甚至与蹙将混称。

刀客分散为各个大小不同的集团，划地自封，最初三五成群，后渐结成大帮，分布的地区，多以豫陕交界处，西安以东沿渭河两岸及渭北最多。以靠贩运私盐、私茶、聚赌或给商家保镖为生。刀客一般都存在义气交往，侠义相助，以逞其志。有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精神，含挟刀浪迹之意，故而史谓“刀客者，仗义行侠之流”。有抱打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义气。辛亥革命时，豫陕交界的大批刀客参加反清斗争，不少成员接受同盟会领导，参加武装起义，侠肝义胆，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成为河南反清、陕西光复的一支重要力量。

20世纪初，清王朝覆灭，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为复辟帝位，袁世凯派表兄张镇芳出任河南都督，此人系前清官僚，到任后，横征暴敛，搜刮民财，把河南搞得乱七八糟，乌烟瘴气，加之地方豪绅残酷压榨盘剥，致使民生凋敝，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横祸飞灾绵绵而至。先是冰雹袭击，尔后山洪暴发，接着持续干旱，大饥荒降临，死神降临。重灾区的豫西南一带，更是惨不忍睹，饥民百姓盼星星盼月亮望眼欲穿，乞求天降甘霖以度众生，可日头依旧如火焰悬于中天，张开血淋淋的大口要把万物烧绝吞尽。灾民们先是吃麻饼，而后啃树皮，挖草根，甚至滑石粉，白土泥，死人肉……官府所谓的赈灾物品被用作他途。一时间，瘟疫、浮肿、天花等病魔乘虚而入，四处蔓延，人倒下去便再也站不起来，路旁、沟岔无人收殓的尸首腐烂得恶臭熏天；村落、山林成群的乌鸦不停盘旋，昼夜哀号。灾民们怀揣着求生的希望，不得不拖儿带女，背井离乡。通往东南部平原地带的道路上，难民冻死、饿死的不计其数，每到夜幕降临，山村野地，鬼灯像野兽的眼睛，闪烁着蓝幽幽的光，四处飘荡。

随着压迫和剥削的日益加重，阶级矛盾日趋尖锐，豫西南地带的大小杆子越来越多，民变组织愈加兴盛，以至于成为民国年间的“毒瘤”。起初，为反清而起势的杆子，鲁山、宝丰较有名的就有申白毛、党中义、刘家宾、丘汝林等。但各股人数不多，参与者白天种地，夜晚集股从事反地主豪绅的斗争，三三两两，势力不大。各股的活动内容亦只限于干些“拉票子”（劫人）、“喊银子”（要钱要粮）等一些为了生计的事情。直至宣统年间，其活动范围迅速扩大。尤其鲁山，除临近城边的几个村寨，四境各乡几乎都有杆子活动的足迹。活动内容也不再限于过去劫人和要钱要粮，而普遍地提出“打富济贫”、“平均地权”的口号。常常全股突入村庄，枪杀富人，占居仓房，把粮食分给穷人。

在豫西，民国时期蹙将刀客杆子的存在乃是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现实，当某个与他们有着某种关系的村庄与其他村庄甚至官府发生冲突时，这杆人马就会挺身而出，平息冲突，这种事情既能引起穷人的效忠，又能博得富人的支持，因而各地蹙将的存在又有着某种政治作用。

尽管官府百般造谣中伤，但蹙将刀客仍是同其他贫民一样的

劳动者，他们和许多人一样，对未来怀着灿烂的梦想。事实上，蹙将刀客活动也并不能通向富裕，对大数决意当一名英雄豪杰的人来说，做蹙将刀客也并非是他们追求的理想生活。在他们看来，蹙将刀客就意味着颠沛流离，只是逃避忍饥挨饿的一种手段，最好的出路在于入军队、民团或者镖队里谋得一官半职，更有一些人梦想积攒了足够的钱后，衣锦还乡，然后娶上一妻二妾，过吃穿不愁的安逸生活。

由于对迫使自己落草为寇的社会不满，由于时刻都冒着尸首分家的危险，由于要同那些压迫者一比高低的强烈愿望……各种因素掺合在一起酿成了残忍的暴力活动。遇到天灾加之人祸，大旱加上大乱，蹙将刀客一哄而起，使茫茫伏牛山荡荡八百里，遇山有匪，入寨见将，或啸聚一隅横冲直撞，或零打碎敲奸淫掳掠，搅腾得中原乃至关中狼烟四起，战火绵绵。

辛亥革命后的 30 多年间，杆子队伍的发展达到顶峰。从武昌起义之初嵩（县）、伊（阳）的王天纵、丁同声、关金钟、张治公、柴云升、憨玉琨等相对较大的刀客杆子集团，到反对袁世凯及其军阀的鲁（山）、宝（丰）白朗的“抚汉讨袁军”起义武装、“老洋人”张庆的“河南自治军”和樊钟秀的“建国豫军”三个万人以上的蹙将武装集团，以及孙世贵、王太、崔二旦、李老末等十数个万余人或数千人的杆子队伍。他们的活动范围，涉及豫、鄂、皖、陕、山等省的广大地区，对社会政治、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特有现象。有些杆子在一些时期，对历史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有些杆子对社会和生产造成了破坏和损失。尤其 1947 年以后，一些杆子追随了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一些杆子则彻底沦为政治土匪，与人民为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剿匪反霸斗争中，被彻底肃清。

对于蹙将刀客甚至土匪们来说，因所处地方的风俗习惯不同，他们都有着丰富的语言和禁戒，但因时间跨度不同，在活动

中所产生的暗语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却是存续了数十年的特殊“文化现象”。

对于“梦、虎、狼、牙、灵、塔、鬼、猪”八个字，今人也许不会有更多的联想，但这些蹉将刀客禁忌的字眼，与东北胡子、山东响马、湘西土匪及其当时的江湖忌讳有着颇多相似之处。在劫财、偷袭某地时，他们大多会在月黑风高的夜间，因而，作为由黑夜生出的“梦”自然成为刺耳的字眼，偶有姓梦（孟）的人，或作了梦，不能叫梦而叫“明”，否则犯忌。对“虎”字的忌讳源于民间视官府为虎，所谓“苛政猛于虎”、虎口丧生等。同样，对“狼”的禁忌源于虎字的延伸，即“虎狼之辈，不可为伍”。“牙”字大约是受衙门的衙字的牵连所致，“死”字更是话语里禁之又禁的，灵魂的“灵”字因凌迟处死的凌字同音，也遭到排斥。对“塔”字的避讳可能是因为塔让人想到墓碑，“鬼”字则是恐怖邪恶的幽灵。憨态活现的“猪”（朱）字遭忌，归因于与诛杀的“诛”字同音。

另外，蹉将刀客及其土匪对“包”字也极敏感，因包字受包围一词的牵累。“谢”字这个礼貌用语容易让人联想到大卸八块的惨状，因而遭忌。另外还有：半、抓、捉、杀、行、毛、放等字，都是忌之又忌的字眼。

生活中一些特别的动作和饮食也成为他们的禁忌。吹口哨本是用来联络的声音，然而一是怕暴露目标，二是口哨的音调容易让人想到阴风飒飒、召唤鬼魂的场面。祭祖求神烧香跪地磕头的动作也是禁忌的，可能是跪下的情形与行刑时的动作有些像仿。吃饭后筷子放在碗上也遭禁戒，因两支筷子像双筒枪或炮管。饭后不得把碗平放在脚前，这缘于当地人死后，脚前会放置一个盛米饭的碗或罐的风俗。打碎杯碗盘碟也被视为犯忌，这容易让人联想起粉身碎骨。睡觉或休息，不能以纸、布蔽脸、蒙面，那样会让人联想到人死时蒙在脸上的草灰纸。

蹉将刀客和土匪的禁忌经常贯穿于大如行动作战，细如生活

琐事之中，如果一不小心说出来了，就是“放快”，轻者遭罚，重者杀死，但这些都有其它可替代的字。久而久之，便成为豫西绿林人物用以交往的一套特殊隐语黑话。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黑话也是地域性的异类文化——“匪类文化”，不管是真匪、假匪、好匪、坏匪，只要掌握黑话暗语、熟悉各种禁忌，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匪”。即便是今天，在豫西南地带的一些风俗人情里，有些口语、动作及生活常识，仍然被沿袭使用，这些所谓的黑话也许只有在那些涉及到的文献书籍和豫西人的口语中，尚有一些脉络，但有的并没有多大的改观。有句话叫“蹚成事儿”或“混成事儿”，意思是通过努力达到某种目的，至今仍在当地沿用。“麦色儿”本是小麦成熟后泛黄的颜色，又与黄金的色调相差不大，因而在黑话中就成了黄金的代名词。“摸码子”是在庙会牲畜市场上的一种交易行为，即：牛经纪与买主卖主之间进行商定价格的一串动作，在腋下或草帽下，用手和手指相互触摸，每个指头皆有数字指向，不需语言交涉，即可完成交易。“捞底”（停下来）则是由平板车或牛车刹车的一种方法，即：双手端着车把，让车尾与地面产生磨擦，以达到制动的作用，这个词现在仍然在使用。还有“抹林子”（抢劫村寨）、“抱火”（攻城握火把的）、“盘下”（停留驻扎）、“开小差”（逃跑）、“内讧”（内部闹不团结）及兑、崩等词语，在人们的口语里还在被广泛应用。

民国时期的蹚将刀客杆子，作为我国史学界的一个研究课题，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目前有关这一问题的资料，尚缺乏系统、周密的发掘、汇集和整理，至今未见到反映蹚将刀客杆子的概貌性资料；另一方面，多年来发表的关于民国土匪的文学作品，也是寥若晨星，且大都属于通俗性和描述性作品，尚未有一部真正具有理论形态和充实的历史内容的作品问世。对“匪类文化”的研究，理应引起更多文化界和史学界同行的注意，把它放在适当的地位进行研究，对揭开民国年间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都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揭示蹉将刀客杆子这一社会群体，在民国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探索这一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规律，能够使人们科学地认识这种社会病态和社会弊端以及消除这一现象的正确方向。人们可以处于不同的动机和愿望，采取种种不同视点和方法，去审视这种现象，从而引出更多不同的结论。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是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任务和职责的，可以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诸种方法，对这种匪类现象作出理论的说明和历史的描述，使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一个科学的认识，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有助于深化和丰富民国社会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研究。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命脉，在人类进步与发展中始终担当着导向和推动的重任。当代中国社会，即将走进以文化大发展促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以文化大发展促综合国力增强，以文化大繁荣促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以文化大繁荣促全民素质的升级提高，以文化繁荣发展丰富全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以文化繁荣发展带动社会和谐文明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中西文化必将全面交汇交融，尤其是在科学发展的新形势下，文化就意味着生产力、竞争力和凝聚力。目前，在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的大专院校，对民国时期的匪患研究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且有多部专著问世，甚至还存在一些局限，但这种异样的“匪类文化”能够顽强地存在和传承，并且得到有关专家的认知，令人欣慰。

如今蹉将刀客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就像经历了 100 多年时间洗涤的关山刀一样，其传说和故事也已是锈迹斑斑，失去原来的面目。但不可否认的是，民国时期的杆子是客观存在的、对社会多方面深有影响的社会实体，它具有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形态，特殊的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独特的思想观念和语言——黑话。蹉将刀客杆子以及土匪皆是普普通通的人，黑话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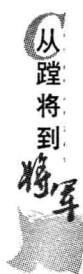
也并非他们独创，而是当地口语及风土人情的另一种表达。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从这些语言的信息里可以发现和感受时代的变迁。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当民国历史的烟尘渐行渐远的时候，那些风云往事也像窖酒一样越来越浓烈。虽然，杆子及其活动是属于社会下层，是一种病态的表现，但历史是一个整体向前推进的过程，其发展变化往往是由各种力量造成，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都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各种力量相互形成一种合力，历史是按照各种合力的方向前推进、发展、变化的。用史学的眼光去审视，用关爱的眼光去挖掘，把前辈人的生存的轨迹进行文学再现，历史的生命才能鲜活的延续、延续

.....

目 录

引子：蹉将刀客杆子	1
接触“革命党”	1
祸从“地”上来	9
两上鳌头山	19
鳌头山规矩	30
遭遇镇嵩军	37
遇上“女光棍”	45
三上鳌头山	54
招抚入嵩军	64
函谷显身手	72
马店街惨剧	81
苦战吉大胆	89
拉起“自卫军”	99
解救万选才	109
编入二十路	119
潢川遇红军	127
郭村兴土木	135
仕途多坎坷	142
创办中小学	150
大骂日军官	157



兵败树掌镇	164
人在困境中	172
参与大会战	179
马头镇起义	188
起义的背后	199
民主建国军	208
赴延安学习	215
延安的感受	223
解放区观感	233
加入党组织	240
主席的关怀	247
是非任由说	253
蹊跷的“叛变”	261
新乡策反记	266
将军的迷茫	272
人性的光辉	278
遥远的回音	286
 窥视历史的底色（代后记）	 299